

城市传记 城市记忆书写的表意实践

芦坚强

(昆明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城市传记是在全球化、现代性与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是城市记忆书写的表意实践。其类型化特点体现于书写地方性记忆与精神、发明城市书写传统和建构面向未来的城市认同三个方面。城市传记希望通过书写城市地方性精神强调人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在社会转型状况下对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重构,是一种传统的发明,以建构城市未来认同为目标,是以个人和故乡认同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具体化。

关键词 城市传记;地方性书写;传统的发明;城市认同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8)02-0114-07

DOI:10.16197/j.cnki.lnupse.2018.02.013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发展及城市文化研究兴起,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这种书写与人物传记相似,以史实为基础运用文学手法进行写作。本文认为书写城市的新方式具有较为明显的类型化特征,是将“传记与方志的写法结合起来,以传记方式书写方志对象由此为城市纪史写传,这样的书写是对城市进行的一种文学性、记传性写作。”^[1]城市传记书写者也倾向于以传记方式命名其书写,“为一个城市写一本书,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撰写一部人物传记。一个地方可以获得某种想象出来的人格特征,乃至获得某种性别,并成为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角色。”^[2]

作为一种新兴的写作形式,城市传记有着怎样的书写特点?是基于何种目的的写作?其书写与传统文学对城市的书写有何不同?本文尝试就以上问题进行相应思考,并对城市传记的内容、特点等进行探析。

一、新兴的传记

文学对城市的书写自古就有。中国文学《诗经》“小雅”“大雅”中都有对周朝都城的描写,汉代文学家以赋书写都城形成专写京殿苑猎的“京都赋”,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开创梦华体写作方式,后世多有效仿之作,民国时期作家们以“梦华体”模式追忆北平之繁华^[3]。现当代文学中有不少作家以书写故乡城市而闻名,如老舍、张爱玲、陆文夫等。西方文学对城市的书写最早见于《圣经》,“占据城市叙述中心的不是城市的建造而是城市的堕落与毁灭,对罪恶之城的诅咒和审判远远超过对于天堂之城的赞美和设想。”^[4]城市罪恶由此占据文学叙述的中心,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则认为罪恶之城与田园乡村是文学被误解的传统之一。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学对城市的书写愈加普遍,波德莱尔的巴黎、艾略特的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卡夫卡的维也纳等无不被读者熟知。

城市传记书写与怀旧思潮密切相关,而怀旧又与全球化、城市化相伴而生。其一,城市传记与全球化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普遍性、标准化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地方文化成为人们希望对抗全球化趋势的手段;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是一种地方化进程,“全球化自身在深层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不平

收稿日期: 2017-09-13

作者简介: 芦坚强,男,山西洪洞人,文学博士,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培育项目“城市传记的地方性书写研究”(项目号:SKPYYB201624)。

衡的乃至地方化的进程。”〔5〕全球化给人们生活带来全方位影响,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急剧变化与重组,使得各种问题成为全球化影响下的“全球地方化”问题。其二,城市传记的出现受到城市化发展影响。随着城市化加快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不少城市建筑被拆除或重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对城市文化、古老建筑的怀旧成为寻找自身认同、应对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一剂良药。其三,从现代性角度看,城市传记的出现是包裹着怀旧思潮面貌的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的“一种独特的表意实践,它不断反思着社会现代化本身,并不停地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意义。”〔6〕

21世纪以来,城市传记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出版与书写行为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如果说传统史诗、诗歌、小说对城市的书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那么城市传记则是有意识的出版与书写行为。首先是与城市传记相关的集体出版行为。近年各出版社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版了与城市相关的系列书籍:2010—2012年花城出版社推出涉及12个城市“名城往事记忆之旅”,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书写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城市的《广西城市传记》丛书,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涉及9个城市“都市地理小丛书”,2012年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8个民国城市的地图“‘在民国’城市地图度藏系列”,2014年三联书店推出“作家与故乡系列丛书”,201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城市家园读本·寻城记”,寻访6个城市,2014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老城影像丛书”,共有涉及6个城市的9种图书。其次是作家有意识的城市传记书写。面对迅速发展、变化的城市,作家们以怀旧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城市,这种形式的书写数量更为丰富,形式也更加多样。北京与上海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首选的书写对象,城市传记作品数不胜数。其他城市的传记作品也日渐丰富,且类似的书写在模式与数量上随着时间推移都在不断增长。

城市传记的书写传统源有二:其一源自方志对城市的书写,作为官方记载一个地方的文本,方志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尽管存在书写者对地方认知的建构,“为地方上的人文传统创造一种连续性”〔7〕,但其严肃性与客观性毋庸置疑。其二是笔记小说对城市的书写。笔记小说脱胎于地记,地记则是方志的发端阶段,“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内容较为简略,神话和传说成分较多。”〔8〕地记中的神话与传说为其后来发展为笔记小说提供了基础。《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等是笔记小说书写的代表,尤其“《东京梦华录》抛弃了正史官样文章的途径,在宋代文学丛林里开辟出了一条以上下通晓的语言记述市民日常生活,回忆都市繁华的笔记小说的创作道路。”〔9〕笔记小说不像方志那样枯燥、刻板地进行记录,而是在灵动、随性的文字中描述城市,“史书上从来不会太措意描述城市的,而笔记里,那些城市却是格外的鲜活。”〔10〕笔记小说是方志以历史方式书写城市的补充,是以文学方式书写地方与城市。

综上所述,城市传记是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受怀旧思潮影响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的重新书写,目的是建构城市文化认同。城市传记的特点可从地方性书写、传统的发明、认同的未来三个维度理解。城市传记主要书写城市地方性历史文化传统,既有现实需求又有未来指向,既有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录与还原,又有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想象。城市传记有意“发明”传统,希望通过传统的连续性完成城市认同建构,通过怀旧书写或发明传统书写城市的过去,但书写目的却是指向城市的未来认同。城市认同是城市传记书写的推动力,全球化与现代性背景下对于城市认同的需要促成城市传记的出现。

二、地方性书写

城市传记书写既包括城市历史,也包括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记忆。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二者书写方式明显不同,“从地方志到档案记录的官方和半官方记载,与同一时期的文学记载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反差。……文学往往更倾向于谈论这座城市本身。”〔11〕城市传记更愿意以文学方式处理历史内容,希望通过书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实,书写内容并非历史学意义上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文学意义上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即使是历史记录意义极强的照片,也由于与文字的互文而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对历史与记忆的区别有较为详尽的论述^[12]。历史与记忆的不同揭示了文学想象在城市传记书写中的作用,文学通过想象与书写将历史转变为城市记忆,城市传记表面书写城市历史,实际是通过想象与书写完成城市记忆的复活与还原,从而完成城市历史建构。在历史纪实与记忆虚构书写中一种新的历史——城市传记产生了。这种新历史依据现实需要,根据现实与过去的关系重新建构自身,既书写城市历史又消解历史的严肃性与真实性,使其成为城市记忆,并赋予记忆连续性和同一性,为城市认同埋下伏笔。

城市传记书写努力寻找并建构地方性精神。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和其他各种问题,更在于它的腔调——所发生事情的地方特色,并将其与什么能够发生的当地想象联系起来”^[13]。事情必然体现地方特色,地方特色就是地方性精神,它与地方思维方式关系密切。地方性既包含地方所具有的空间含义,又强调事情发生的地方文化语境,地方性精神在地方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下形成,同时又以理性形式影响着地方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理解的地方性是“一个地方特殊的精神。这个词告诉人们的是人们体验到一个地方那些超出物质的和感官上的特征的东西,并且能够感受到对这个地区精神的依恋”^[14]。迈克·克朗不仅强调地方性的精神特质,更强调文学与艺术表现地方性精神的独特作用,文学与艺术能够深入心灵和情感领域将人与地方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刻而真实的表现。格尔茨与迈克·克朗都认为地方性精神对于地方具有独特的意义,能够超越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深入根本。至于文学与艺术在书写、表现地方性精神方面的独特性,也可从黑格尔对诗的论述中见出端倪,“诗人因此能够深入到精神内容意蕴的深处,把隐藏在那里的东西搜寻出来,带到意识的光辉里。……语文毕竟是最易理解的最适合于精神的手段,能掌握住而且表达出高深领域的一切意识活动和内心世界的一切东西”^[15]。黑格尔认为相比于其他艺术,文学(诗)不受物质媒介材料的局限,能够直接运用语言最深刻地表现全部精神意蕴。在此意义上,书写城市及其地方性精神的重任非文学莫属。

城市地方性精神体现了人与城、城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是城市传记的书写重点。不同自然地理空间、外在物质条件形成不同的城市,人们的生产活动又孕育相应城市文化。赵园在论述北京的地方性精神“京味”时曾对人与城、城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进行描述:“‘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这人与城之间的关系的深刻性在于,当着人试图把那城摄入自己的画幅时,他们正是或多或少地用了那个城所规定的方式摄取的。‘城’在他们意识中或无意间进入了、参与了摄取活动,并使这种参与方式进入了作品。”^[16]在复杂交织的互动影响中独特的地方性精神意蕴产生了,它是某一城市区别其他城市的核心所在。城市地方性精神能够突出自身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因此城市传记不遗余力地书写城市地方性精神。

三、发明的传统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晚近很多传统都是被发明出来的,“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17]。城市传记书写在此意义上也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在此需要将两种与城市传记有关的传统区分开来,以明确城市传记是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观点:一种是城市传记所书写的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另一种是城市传记书写行为。前者是城市传记的书写对象,后者是城市传记出版与书写行为,本文所指“传统的发明”主要指后者,指城市传记出版与书写行为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作为被发明的传统,城市传记出版与书写具有仪式化和象征性特征,并通过重复性完成意义赋予。“‘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18]其一,城市

传记是一种重复性出版与书写行为。不同出版社不断出版与城市有关的传记,作家们也重复书写着城市传记。有些作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被出版,晚近又被再版,如林语堂的《大城北京》在2008年和2015年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如齐如山的《北平》《北平怀旧》《北平小掌故》三书以《北平杂记》的形式于2015年被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这些作品内容与初写时相比并无变化,但重复性出版行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它们以写下城市历史记忆的传记形式被重新认知。有的作家则从不同角度反复书写城市传记,如于坚在2000年写下《昆明记》,2015年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再版《昆明记》;海男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写下《新昆明传》和《滇池传》。他们希望在反复书写中赋予城市及其历史文化不同意义。其二,重复性出版与书写形成重复性阅读,在重复性书写与阅读中作者与读者赋予被阅读对象以神圣性,书写与阅读成为仪式性膜拜城市的重复性行为。作者与读者可以熟悉与城市有关的历史文化事件、沉浸于城市的历史记忆之中,一方面在观照城市历史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建立自身与城市及其历史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对城市发展的未来期待中形成城市认同。书写与阅读行为既指向城市过去又展望城市未来,还包含现在对稳定性的追求,以应对流动的现代性、时间向度的过去、现在、未来和空间向度的城市与人相遇,人与城在时间与空间上融为一体。

城市传记也是在集体记忆框架下对城市集体记忆的书写。出版社或作家的出版与书写看似个体式行为,城市传记实则是根据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集体记忆框架进行的书写。出版社与作家通常“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19〕,他们依据集体记忆框架能够重建城市意象并书写城市记忆。如果说哈布瓦赫在论述集体记忆时认为家庭、宗教群体、社会阶级等是集体记忆的框架,那么在城市传记书写者看来城市也是集体记忆框架之一,它能够将有关记忆组织起来并被人们回忆。在扬·阿斯曼看来城市传记书写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人类维持其本质能够代代相传的方法,也是一个社会能够重构自我文化身份的凭借,“文化记忆的概念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20〕。凭借文化记忆每个群体都可以建立自我意识,将自我形象、仪式保存下来。城市传记正是在文化记忆基础上书写城市建筑、历史、传说等意象,建构城市形象以完成城市认同。

城市传记还是基于现在而对过去进行的重构。城市传记书写是由于社会现实急速变化导致旧有传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不得不“发明”新的传统以适应社会需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21〕,传统的发明会更为频繁地出现。中国城市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红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急速变化的结果,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人口急剧增加、建设日新月异、社会关系重组、传统心理结构改变……在此背景下,旧城与新城、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整体、记忆与认同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城与人如何发展、如何面对自我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困境,过去成为城与人认识自我的“他者”与起点,城市过去被依据现实需要重新书写与建构,其“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22〕。然而,城市传记以怀旧的方式回到过去,却以不曾预想的方式重构了城市传统。

城市传记以发明传统的方式回应现实变化,也由过去与现在的同一性引出身份认同问题,就此意义上而言,城市传记指向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四、建构的认同

城市文化是城市传记认同书写的基础。如同民族性以共同的民族文化遗产为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

城市文化也为城市传记提供了认同基础并且“培育了一种差别感:它本身就说明自己不同于其他”〔23〕。文化认同性的三重维度〔24〕是文化认同的表征,以此为准绳能够辨析城市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所在:从历史角度看,尽管城市文化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有所变化,但认同的文化基础保持稳定;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在城市的活动创造了相应文化,城市文化又反过来规范着城市中人的活动,人与城市文化的双向动态影响是人与城关系的写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人在创造城市文化的同时已经认同自身活动创造的价值观,并由此形成城市认同,实际上很难泾渭分明地厘清人们认同的是城市本身还是城市文化。

在全球化与现代性背景下,城市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和现代性进程造成时空压缩(哈维),形成脱域机制(吉登斯),导致时空和社会关系重组,人所栖身的社会、文化环境面临重组,本土文化兴起和全球化、现代性的共同综合发展就是一种文化融合、重构的发展过程。城市文化成为此背景下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城市认同取代民族文化认同成为文化认同的新形态。这一文化认同的流动性和变形过程与时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如果说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是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则是以经济意识形态为主导。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中认同基础是新政权形成的新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融合与百花齐放说明以多元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新的民族国家能够兴旺昌盛,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得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认同涵化为一种新的文化认同,民族文化或民族身份不再被刻意强调,经济发展和奔向小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较灵活的经济主体,城市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加之人们对小康社会的祈盼与想象、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使城市与城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愈发举足轻重。于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城市文化就成为缝合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中介,城市文化认同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表征。

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继续,城市传记对认同的书写还隐含两种深层的认同书写结构:其一是现代社会中个人认同的需要,其二是故乡书写的继续。城市传记是这两种认同书写的延续或变形。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急速变化重组,传统文化观念被摧毁,个人身份认同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在冲突与断裂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完成自我定位?如何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同一性?如此种种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现代社会发展使认同焦虑成为一种症候,对自我同一性的追寻成为解决认同焦虑的有效手段,因为只有在不为时间的多变性和空间的多重性所左右的同一性之中人才能保持自我,从根本上来讲认同就是个人自我的认同。个人认同需从两个层面确认,“从历时性的层面来看,身份认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个体历史建立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共同作用这一过程,而个体的身体性以及与其关联的感性感知世界的方式是认同的核心。……从共时性的层面来看,身份认同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25〕。城市传记书写从历时、共时两个层面将个人认同与城市认同缝合并完成对自我认同的确认:历时性层面,城市传记以个人焦虑为起点追寻城市历史过去,目的是确定可知的未来,城市传统的同一和未来的可知有助于自我认同确认;共时性层面,自我认同的同一性需求被建构为城市文化认同,个人认同需求被城市传记缝合至城市文化的同一性书写。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个人认同与城市认同的缝合是个人认同转向社会认同的过程,也是将个人范畴化的过程。社会由不同的社会范畴组成,社会范畴如民族、国家、阶级、宗教等相对稳定,“满足了个体和社会对于秩序、结构、简洁和可预测性等的需求”〔26〕,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且先于个体存在。为加强对自身认知,个体需要将自我放置于相关社会范畴中——自我范畴化,“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的所有成员均被感知或判断为拥有某些共同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将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27〕。如此一来个体完成向群体的转化,也完成社会性层面的自我认同建构。独特性、差异性鲜明的城市在现代性身份焦虑背景下成为个体认同的社会范畴,城市传记正是利用这一点建构人们的社会认同。

中国文学历来有故乡书写的传统。无论是现代时期知识分子为追求个人理想、化解现实矛盾对故乡进行的书写,还是新时期人们在寻根文学感召下返回故乡与传统的书写,抑或在怀旧思潮影响下进行的

书写 故乡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故乡书写能够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如今传统的故乡书写逐渐被城市传记书写所取代。

城市传记书写与故乡书写具有相似之处,差异也同样明显。首先,作家书写故乡多源于时间上对童年记忆的回忆、空间上与故乡的分离,书写具有较强怀旧意味。城市传记书写也可能源于作家对童年的回忆,但不一定表现为空间上与城市的分离,其书写尽管也怀旧,但更多表现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建构。其次,如果说在故乡书写中传统尚能为个人认同提供相对稳定的保障机制,故乡书写能够满足安全感追求的话,那么城市传记是个人将认同缝合于社会认同或城市认同的过程。吉登斯认为晚期现代社会中的自我面临统一与破碎、无力与获取、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等多方面两难困境^[28]交织的威胁,人们很难从传统那里获得稳定的保障机制,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重构。城市传记书写就是在故乡书写基础上对传统重构的一种努力。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对自我认同的追寻需要通过自传方式完成,需将传统稳定机制缝合于现代社会之中。由于此时的故乡已非童年模样,人们无法再以故乡怀旧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建构,只能将目光转向当下生活的城市及城市生活方式,书写当前城市现代生活方式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我们不仅追随生活方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被迫如此。……它们为特定的自我认同叙事提供了物质形式”^[29]。个人自我认同叙事被迫缝合于现实生活城市的认同叙事书写之中。

五、结语

作为一种文化表意实践,城市传记书写深受全球化与现代性影响,是基于现实认同焦虑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的重新书写,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城市传记是在方志与笔记小说基础上进行的文学而非历史式书写,在寻找与还原城市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过程中努力寻找城市地方性精神意蕴,在建构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树立城市精神的地方性标签,既能够应对全球化与现代性带来的影响,又能为城市认同建立基础。在此过程中城市传记缝合了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并以个人认同和故乡书写完成民族文化认同的具体化书写。

参考文献

- [1]芦坚强. 昆明形象的文学书写[J]. 学术探索, 2015(2):140.
- [2][11][澳]安东篱. 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M]. 李霞,译,李恭忠,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1、8.
- [3]季剑青. 追忆逝去的北京——民国时期北京的“梦华体”著述[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40.
- [4]陈晓兰. 圣经中的城市[J]. 中国比较文学,2006(4):84.
- [5][美]阿尔君·阿帕杜莱. 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 刘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24.
- [6]周宪. 审美现代性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1.
- [7]王昌伟. 从“遗迹”到“文献”——宋明时期的陕西方志[A]. 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 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3.
- [8]戴鞍钢. 中国地方志精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7.
- [9]伊永文. 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J]. 求是学刊,2009(1):114.
- [10]齐如山. 北京杂记[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1.
- [12]冯亚琳. [德]阿斯特莉特.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5-96.
- [13]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215.
- [14][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宋慧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1.
- [15][德]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册)[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2.
- [16]赵园. 北京:城与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5.

- [17][18][21][22][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2、5、2.
- [19][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1.
- [20][德]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A].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11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
- [23][24]《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C].萧俊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3、11.
- [25]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2015.20-21.
- [26][27][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M].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26.
- [28][29][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88、76.

Urban Biography: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 of Urban Memory Writing

LU Jianqiang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Urban biography is a new form of writing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urbanization, which is the signifying practice of urban memory writ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writing of local memory and spirit, the invention of urban writing tra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urban identity. Urban biography hopes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place by writing the local spirit of the city. This is not only a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but also a traditional inven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ims to construct urban identity. Urban identity is based on personal identity and hometown identity, and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biography; local writing; traditional invention; urban identity

【责任编辑 康艳】